

姑 末 考

——兼论江南河谷平原地带中历史人文地域之形成

钟

(京都大学大学院 人间・环境学研究科, 日本 京都 606- 8501)

摘要:“姑末”地域,在中国江南的地形和生态地带区分上属于典型的河谷平原类型。将该地域置于江南数千年开发史中,检讨其形成之历程,通过这样一种历史地理学个案考察,可以为中国东南一带历史人文地域研究提供发生学上的考察标本。为此,主要收集、整理和运用了以下三种材料:关于“姑末”的早期文献记载、秦汉以来有关“姑末”地域的沿革地理记录、基于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语言分布地图等,以此来描述和论证“姑末”地域在各历史时期的存在与演进,并对这一历史人文地域的文化特质、与相邻地域的关系等问题加以简单分析。

关键词:“姑末”地域;江南河谷平原;历史人文地域;历史地理学考察

中图分类号: F014.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293/Z(2005)01- 0047- 10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展而言,把握广阔多样、多元一体的中国的各地域特质,进而运用有关各地域具体状况的细密资料,开展针对各地域的综合研究,必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进行这样的研究,对象地域肯定不会是一个不变的、孤立的空间,因此,在研究中必须尽可能地取得可以反映该地域之自然环境变迁、社会变貌等自然和人文演化的种种因素和现象。

以中国的江南一带而言,早期“百越”的历史传统和地理分域,对本区域内各历史人文地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可通过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多种角度研究,找到各地域早期土著文化的印痕。目前,上述种种研究的前端已经触动了“汉文化以南迁的北方汉人为载体,向南方传播”这一根深蒂固的先验假

设。^①不过,在这一类研究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个案研究显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于江南河谷平原地带中各历史人文地域的形成、区分及地域性等问题,尚缺乏运用通时性视点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既往的研究显示,欲究明江南各地域的开发历史和演变过程,则至少应该有“三角洲”和“河谷平原”这两大类型的生态地带的区分。^②在江南丘陵和山区,由于河流的侵蚀——堆积作用形成了许多或宽或窄的河谷平原,对于当地的小规模稻作农民来说,这些河谷平原最易于施行传统的耕作管理,因此,在江南诸地域中,这一类土地必然较早地得到了开发。可是,相比“三角洲”地带研究的发达,^③有关“河谷平原”地带的研究,除了本

收稿日期: 2004- 11- 21

作者简介: 钟 (1971-),男,浙江浦江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① 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综述性的议论可以例举邓聪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从语言学到考古学》一文,收入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② 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应该特别提到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一书第七章《宋代江南的生产力评价をめぐる》的相关论述。

③ 值得一提的是陈桥驿(如《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载《地理学报》28- 3,1962)、周藤吉之(如《宋代浙西地方の围田の发展——土地所有制との关系》,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39,1965)、斯波义信(如《宋代明州の都市化と地域开发》,载《待兼山论丛》3,1969)、长濑守(如《宋元时代江南デルタにおける水利・农业の技术的展开》,载《历史人类》9,1990)、滨岛敦俊(如《明末清初,江南デルタの水利惯行の再编について》,载《社会经济史学》40- 2,1974)等人的研究成果。

田治^④、大泽正昭^⑤、上田信^⑥等学者的工作之外,还很不充分。

鉴于上述考虑,在本文中,取江南河谷平原地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浙江省西南部山区丘陵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地域,对历史上在这一带活动的“姑末”部族试作一历史地理学考察。

一 文献史料所见之“姑末”

由文献史料可知,大约 3000 年前,在今天浙江省金衢盆地西部的河谷平原地域,曾经存在过一个称为“姑末”的部族。关于这个“姑末”部族,通过零星记载能了解到的是:(一)部族名为“姑末”,并有“姑妹”“姑蔑”“姑篾”等别称;(二)“姑末”的中心地称为“姑蔑城”,位置大约在金衢盆地西部的今龙游县境内;(三)“姑末”大概是西周以来存在于江南一带的方国或部族;(四)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姑末”已为其强邻越国所并。除此以外,别无详细的考证,有关它的历史和地域分布等情况更是未能明了。

“姑末”部族活动之际,正是中原文明曙光初露,南方部落音信互通之时。当时位于江南的“於越”、“东瓯”等方国部族,经传史乘屡有记载,近代以来卫聚贤^⑦、罗香林^⑧、蒙文通^⑨、韦庆稳^⑩、董楚平^⑪等学者也多有研究论述。惟独“姑末”史事鲜有人道及,究其原因,盖春秋之际,“姑末”已为越国所并,而其数百年文明史亦渐至湮没不彰。

大概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层关系,历史上关于“姑末”的记载可谓绝少,遍搜先秦古籍仅见三则,后世文献有关“姑末”的议论也大多依据这三则记载。在本节中,先以这三则记载为中心,并搜集其它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据以探索有关“姑末”的一些史实。

(一)《逸周书》中所见之“姑末”

现存文献中记载“姑末”者,以《逸周书》最早。是书《王会解》篇描述周成王在成周会见八方部族,接受他们贡纳特产的盛大典礼,其中提到:

东越海蛤。瓯人蜚蛇,蜚蛇顺,食之美。姑於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屋,共人玄贝。海阳大。自深桂。会稽以。皆西向。^⑫

这里所说的“姑妹珍”,是有关“姑末”的历史记载的开始,所以有必要围绕这条记载作一番考察。

首先,必须分辨一下此处所提“姑妹”,与下文提到同地异名的“姑篾”(见于《国语》)、“姑蔑”(见于《左传》)、“姑末”(见于《越绝书》与《吴越春

秋》)、“大末”(见于《汉书》等正史)之间的远近由来关系。由于现在尚未发现有关此地名由来的强有力的文献或实物证据,所以分析这一问题还需从文献、音韵、文字等几个方面作综合考虑。

从文献上看,《左传》《国语》和《汉书》地位崇高,校勘也最为精良,记载的可靠性最高;《越绝书》与《吴越春秋》虽然早期刊本不存,不过两书于地方史料之存真,历来评价甚高,可称信史;《逸周书》史料价值颇高,但其文字散乱舛误,向来视为校勘之畏途,即使今天所见最早的元刊本也已经过多次的辗转传递。

从音韵上看,“篾”“蔑”与“末”在古音上彼此之间接近,都是明母月部,用于先秦方国部族名称时,相互通假的可能性很大。相对来说,明母物部的“妹”字在古音上的联系不如上面的“篾”“蔑”与“末”诸字。^⑬

从文字的发生上看,上古以“末”字最常见,而“姑末”二字联用时,“末”字容易受到“姑”字偏旁的影响而类化成“”字。一如“凤凰”之“凰”,在上古文献中均作“皇”,后来因受“凤”的影响,加上外框成了“凰”,从“末”到“”有可能也是如此变化而来的。因此,《逸周书》“妹”在最初有写成“”的可能性,又由于“姑珍”太令人费解,实在不如“姑妹珍”这样一个很有联想余地的名称,则“”字复为后世之人误用成“妹”。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来看,《逸周书》中的“姑妹珍”虽为现存文献中记载“姑末”之最先,但今所见之本未必可靠,且“妹”字与其它文献记载的名称在古音上分歧最大。而《越绝书》《吴越春

④ 本田治《宋代婺州的水利开发— 陂塘を中心に —》(《社会经济史学》41— 3, 1975)等文。

⑤ 大泽正昭前揭《第八章〈宋代河谷平野地域の农业经营について— 江西・抚州の場合 —〉》等文。

⑥ 上田信《地域と宗族— 浙江省山间部 —》(《东洋文化研究》94, 1984)等文。

⑦ 见卫聚贤《吴越民族》(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所收,江苏研究社,1937)。

⑧ 见罗香林《古代越族的文化》(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所收)。

⑨ 见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研究社,1983。

⑩ 见韦庆稳《试说百越的民族和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所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⑪ 见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及《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等。

⑫ 黄怀信等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会校集释》卷七《王会解》第五十九第 890— 90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⑬ 此处古音均从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秋》中的“姑末”，与《国语》《左传》所记的“姑蔑”、“姑蔑”古音相通，并为《汉书》及后世所继承（即从“姑末”到“大末”、“太末”的变化，详下节），在文字的发生上看，“末”字写法较古，而且从“末”到“”及“妹”这样一类的变化也属于常见，所以本文在行文中暂依《越绝书》《吴越春秋》作“姑末”。

其次，还要再看看这一处文献记载的真实性。《逸周书》记载周代历史的史料价值，近代以来随着早期文明研究的发达而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更有学者考证出《逸周书》全书的编定，大约在春秋晚期周景王（544BC—520BC）之末季，^⑭这也就是证明了《逸周书》编纂的是当朝史事，所以它的内容大体应该相当可靠。至于《王会解》这一篇，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依据描绘成周之会的图画记录下来的，如同《山海经》依据描绘山海的图画而作成的一样，但文中所存国名地名，上缀《禹贡》，旁稽《职方》，或与后来书志、铭器相合，或为后世所罕见，都足以证明这些记录是西周早期的历史事实，对于这一点，后来的学者也很少有疑问。^⑮

还有一个不放心的地方。在先秦文献中，类似这里所提到“姑妹”这样的地方并非只有一处，春秋时代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还有一处称作“姑蔑”（下详）。那么，应该如何排除《逸周书》中“姑妹”与鲁地“姑蔑”的干系？解决这个问题要从这段记录本身入手，很明显，《王会解》篇对于八方部族和贡物的描述并非散漫无章，而是遵循一定体例的。从这段文字记载的顺序上看，就可以简单判断这里记载的“姑妹”必然落在地处江南的东越、瓯人等方国（或部族）之近旁，而非地处成周之东的鲁地“姑蔑”。

关于《王会解》中“姑妹”的地望，晋代孔晁的注释很有价值：“姑妹，国，后属越。”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孔注的简略和某些谬误，向来批评较多。但孔晁时在晋代，所作注释不乏可靠的部分，必须分别对待。已经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孔注中，特别像“路人大竹”“姑妹珍”这一类古典的方国名物，断难擅自增益，当时必有所据。^⑯而以孔晁的解释与《王会解》篇的文章体例两相印证，《逸周书》所载“姑妹”在今之江南越地应该可以确定。

通过这样的分析来看，成周之际，东南方国（或部族）的贡品中确实已有“姑末”的特产了。这种名为“姑妹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仅能依靠清代学者何秋涛从文字学上的解释，认为它可能是一种玉的名称，并由此推测姑末国以玉为贡。^⑰至于这次纳贡的时间，《竹书纪年》记载在周成王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

宾。”^⑱近年来的研究确定周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那么周成王二十五年应该是公元前1018年，^⑲也就是说，“姑末”的历史记载的开始，距离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了。

在《竹书纪年》和其它一些早期的文献中，常常提到这一次成周的盛会，可惜都没有具体言及“姑末”。不过《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在成周之会的前一年，周王朝接待了“於越来宾”。^⑳可见在当时，作为东南一带最有代表的部族“於越”，与中原王朝的接触已经颇为频繁。这样看来，《逸周书》记载的在同一时期、在地理上与“於越”密迩相接

^⑭ 见黄怀信《逸周书时代略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⑮ 参杨宽《论〈逸周书〉——读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手稿本》，载《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

^⑯ 参刘重来《〈逸周书〉孔晁注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二）》所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⑰ 何秋涛《王会篇笺释》云：“今按珍与通，《广韵》：‘，玉名也。’……凡从之字，古多与从真之字相通。盖姑妹国以玉为贡也。”引自《逸周书会校集释》前揭⑫，第896页。

^⑱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二十五年”条，四部丛刊本。

^⑲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编《夏商周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6—8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⑳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二十四年”条。是为现存文献中有关“於越”之最早记载，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对于此条记载的真伪，陈桥驿有如下见解：“对于这个地区历史记载的开始，必须提及《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的‘于越来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记载见于今本《竹书》，由于今本《竹书》出于南宋，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自序》：‘《今本》两卷，乃后人所辑，复杂采《史记》《通鉴外记》《路史》诸书成之，非汲冢原书。’很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的确，宋人在辑录时有过一些改动。但当时能见的引用《竹书》的古籍远比今天要多，因此，今本所记，必须分别对待，不宜一概否定。对于周成王二十四年这一条，是真是伪，有必要进行分析。首先，外族来宾，是《竹书》常记的大事，已经成为一种体例。古本中如相七年的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时的方夷来宾均是其例。其次，今本《竹书》关于于越的记载，有两条可以证实其不虚，即周元王四年‘于越灭吴’，周赧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前者与《史记·六国表》所记完全符合，而后者在《越绝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越绝书》卷一提到‘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又卷二也提到‘勾践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最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今本《竹书》的这条记载，还可以与越地流行的传说加以印证。《论衡·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异虚篇》记得更明白：‘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以《竹书》与《论衡》对照，越尝献雉于周公，正是成王的时代，虽然此时周公已归政于成王，由于周公的声名崇高，故越人的传说中仍称周公，这是可以理解的。王充的时代，《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论衡》的记载，当然绝非出于《竹书》而是来自越地流传的传说。两相印证，则今本《竹书》的这条记载属实。所以我在《于越历史概论》一文中说：‘对于《竹书纪年》的记载，不管古本、今本，都应给予分析地对待。’参见陈桥驿《先秦时代与秦汉时代的杭州》之中文原稿，原文刊于千田穉编《东アジアの都市形态と文明史》180页，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京都），2004年。又，杨树达曾以甲骨卜辞中所见商王名有仅见于今本《竹书》者《积微居小学述林》第271页之“书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后”条，中华书局，1983），来论证今本《竹书》之存真，最为可信。此点蒙京都大学文字学博士（在读）陈捷指教。

的“姑末”部族与千里之外的中原王朝互通问聘,也应该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综合以上分析给人的印象是:至少在西周早期,“姑末”大概与越、瓯等地理上相近的方国(或部族)地位相当,而其形成的历史则应更为久远。

关于 3000 多年前的“姑末”,由于文献的简略,考古的缺如,目前尚难得其详。不过还可从“姑末”这个族名上来作一些考察。

前面《竹书纪年》提到了“於越”,而《逸周书》同时提到“会稽”^①和“姑蔑”,至于当时这两者关系则无更多记载。但“於越”一族,在春秋之际因吴越争霸而彰显于世,已经确定为有别于中原华夏民族的古越人。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古越人所操之古越语具有发达的发语词,比如“於越”之“於”、“姑苏”之“姑”等。而“姑末”之“姑”,犹“姑苏”之“姑”,当属古越语中常用的发语词。^②据此推测,“姑末”部族应该跟相距不远的“於越”部族一样,同属古代的越人。

(二)《国语》中所见之“姑末”

“姑末”于文献之再度出现,已是距今约 2500 年前的春秋之末。《国语·越语上第二十》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 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③

与此类似的记载,在后来有关越史的主要文献如《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均可见到。如《越绝书》中提到:吴败越,吴王复还封勾践于越,其地“东西百里,北乡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 干。覲乡北有武原,武原今海盐,姑末今大末, 干,今属豫章。”^④《吴越春秋》亦云吴王赐越王勾践之封,“东至于句甬,西至于 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⑤并将此条记载系于越王勾践七年(490BC)。这三条记载的文字、句式大致相同,大概是同源的史料,很有可能就是来源于越国国史的记载。

但是,三国吴韦昭注《越语》时却说:“姑蔑,大湖是也”,这种解释十分可疑。首先,“大湖”即太湖,“ 儿”在今嘉兴市境内历来沿革清楚,没有疑问,则从方位上看“大湖”当在“ 儿”正北不远,与上面《越语》原文记载不合。其次,以《越绝书》《吴越春秋》的记载和上述的文献分析参证,亦可知韦昭注之误。此外,以笔者查阅所限,太湖一带称为“姑蔑”的记载仅见于此,而“姑蔑”之于今龙游县一带则有丰富的佐证,韦昭的主张实在太孤立,难以令人信服。

所以我们可以说,“姑末”在越王勾践之时(496BC—465BC)已经是越国疆域的一部分了,这

一点也与孔晁“姑蔑,国,后属越”的说法一致。另外,“姑末”与越的相对位置也渐渐清楚了——它必定是越的西邻,实际上只要通过《越绝书》和其它的记载,还可以很好地了解“姑末”地域的空间分布(详下节)。总之,由于这样的一些记载,我们相信:在西周初还保有名号的“姑末国”,通过后来部族兼并、联合的过程,最终被纳入了它东面强邻越国的疆域之中。

(三)《左传》中所见之“姑末”

先秦文献关于“姑末”的另一处记载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传》中有关吴越泓上之战的开头部分,是年(482BC):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王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於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讎而弗杀也。”^⑥

关于这里的“姑蔑”,杜预有注:“姑蔑,越地,今东阳太末县。”与此相联系,宋代《新定九域志》的“衢州”条中引南朝宋《东阳记》^⑦:(“姑蔑城”)又东阳记云:在 水南三里,东门,临薄里溪是也。”^⑧根据这些记录应该不难确定“姑末”的中心地——姑蔑城的具体位置。经过实地调查已经清楚,它就在上面杜预注提到的六朝时东阳郡太末县,即今天浙江省龙游县的县城附近。^⑨

①何秋涛《王会篇笺释》云:“《王会篇》所言会稽之国盖即越地,举其都地以为名也。”引自《逸周书会校集释》前编 12903 页。

②参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载《复旦学报》1980 年第 3 期。也有学者认为“姑”在古越语中作地名时为中心词,可解释为“地块”。参见郑张尚芳《古越语》(载董楚平、金永平编《吴越文化志》上编第十章,270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③《国语》此处所记“姑蔑”,因刊本不同或有写作“姑蔑”的,本文据《国语》之宋《公序本》。

④《越绝书·卷第八外传记地传第十》,乐祖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⑤《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第八》,四部丛刊本。

⑥《左传》于“姑蔑”一地凡两见。另一处见于定公十三年,按杜预注为鲁地之“姑蔑”,与本文所言越之“姑蔑”不得以混同。

⑦《东阳记》是南朝宋时东阳郡的地方志,也是现在所知记载后世衢州、金华两府地方最早的方志。原本久佚,仅见《水经注》《太平御览》等书所引。据《旧唐书·经籍志》“东阳记,一卷,郑辑之撰”和《隋书·经籍志》“孝子传赞,十卷,宋员外郎郑辑之撰”两处记载得以了解该书的作者和编撰时间。

⑧黄裳《新定九域志》卷五《衢州》条(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下册 623 页,中华书局)。

⑨有关这一点拟作别稿再考。简单地讲:水即现在衢江是没有疑问的,而“薄里溪”即今天龙游县境内的灵山河也还可以考出,现在“薄里溪”之名在当地虽已弱化,但于灵山河某些江段依然有迹可寻,因此可以确定姑蔑古城的位置。

此外,关于“姑蔑之旗”和领导“姑蔑”军队的“畴无余、讴阳”两人,杜预分别留下了“弥庸父为越所获,故姑蔑人得其旌旗”和“二子,越大夫”的注释。“姑末”军队必先获“弥庸父”之旌旗,然后才参加泓上之战的,看来“姑末”军队在越国属下出征之事已经常常有之。不过,从泓上之战时“姑蔑之旗”的记载来看,“姑末”军队与越的军队应当有某种程度的区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姑末”还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或称之为地域性,而这种地域性的保留,应该是受了早期“姑末国”存在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由于史料的局限,以上有关“姑末”早期历史的分析还是相当简单的。为此,再进一步翻检后世与“姑末”之有关的衢州、处州、信州三府诸府县方志,值得一提的只有一条半信半疑的记载。在“姑末”的中心地,即后世衢州府龙游县的万历《龙游县志》中有:“周姑蔑国,子爵,越附庸也。”^⑩若此条记录为真,尚可进一步推知:“姑末”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位尊子爵,而后从属越国这样的情况。不过,此则记录只见于明代的地方志,又未载出处,可靠性很成问题。它的依据恐怕还是不出《逸周书》《国语》《左传》三书的记载和注释,正如余绍宋的判断,“未知所据,未敢率录。”^⑪

二 大末县之沿革地理与“姑末”地域之成立

在上节中对“姑末”存在地域性的想法,为本节讨论的发端。

有关“姑末”地域性的问题可以解释为:像“姑末”这样一个已经被证明具有悠久历史的地理空间,存在于江南丘陵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安定的环境之中,通过数千年演化,是否会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历史人文地域单元?要研究此问题,必得进一步了解该地历史地理之具体状况,分析其行政区域演变的历程、人文开发的展开、自然地理背景等事象,进而考察该地共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并确定它与相邻历史人文地域的分异。

为此,搜集先秦以来故“姑末”之地的相关历史文献,发现除传统的沿革史料(即行政区域演变史料)之外,有关该地历史地理的记录大多残缺散漫且难以连缀。因此,在本节中,着重于本地相关各县的沿革变迁资料,以之为研究地域性的初步材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行政区域演变的侧面作进一步考察。

之所以主要利用县的沿革史料,是因为就浙江省的河谷平原地带而言,各地域的开发史与县

的分析增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根据谭其骧的研究:作为历代地方行政区划基本单位的县,其设置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而其设置之标准,历代大致相似,虚置滥设较少。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就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⑫从此观点出发,来研究处于浙江省河谷平原地带的故“姑末”之地沿革史,对了解该地人文开发的展开等问题应该有效。

整理故“姑末”之地历代各县沿革史料的结果较为令人满意,与相邻的婺州、台州、温州等区域比较,以本地区的资料最为完整,各县的分析设置亦线索分明。为此制成表1和图1、图2。

通过上一节的文献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些“姑末”的早期历史。表1显示了从古“姑末”与它的中心地——姑蔑城,到它的“直系后裔”——秦汉的大末县,以及后世龙游县的一脉相承的沿革历史。

首先,由《越绝书》中“姑末今大末”(表1⑥)的记载,可知“姑末”在汉代已改称“大末”。再由《汉书·地理志》,可知西汉会稽郡的属县之中已有“大末”一县(表1⑦),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大末”的最早记载。据此,则至迟到西汉已有“大末”县的设置了。

又《水经注》载:“浙江又东北流至钱塘县,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为县,王莽之末理也。”^⑬(表1⑤⑧⑪)这条记录重要之处在于它明确了大末县在秦代即已存在,由此将先秦的“姑末”与后世的大末连缀起来。此后,大末县县名又有数次改变,至东汉改称太末(表1⑨),至唐贞观八年(634)又改名龙丘县(表1⑩),至五代吴越宝正六年(931)始称龙丘县为龙游县(表1⑪⑭),自此以后,它作为一个县的设置一直维持至今。

^⑩王廷谦修万历《龙游县志》卷之一《舆地·沿革》,日本京都大学汉字情报研究センター藏,据日本东洋文库藏1612年刊本影印。该志为龙游县现存最早之方志。

^⑪余绍宋修民国《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沿革》,浙江图书馆藏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排印本。

^⑫参谭其骧《浙江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水经注》404页,人民出版社,1987)。

^⑬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69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表 1 “姑末”历代沿革表

名称	记录	时代	出典
① 姑蔑	“曰姑蔑珍”	西周	《逸周书·王会解》
② 姑蔑	“西至于姑蔑”	春秋	《国语·越语上》
③ 姑末	“南,姑末,干”	春秋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
④ 姑蔑	“(吴王孙)弥庸见姑蔑之旗”	春秋	《左传》哀公十三年
⑤ 大末	“秦以为县”	秦	《水经注·渐江水》
⑥ 大末	“姑末,今大末”	西汉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
⑦ 大末	会稽郡“大末”县	西汉	《汉书·地理志》
⑧ 末理	“王莽之末理也”	新(王莽)	《水经注·渐江水》
⑨ 太末	会稽郡“太末”县	东汉	《后汉书·郡国志》
⑩ 太末	贺齐“转守太末长”	三国	《三国志·贺齐传》等
⑪ 太末	“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南北朝	《水经注·渐江水》
⑫ 太末	“太末”县	南北朝	《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等
⑬ 龙丘	贞观八年,“更名龙丘”	唐	《新唐书·地理志》
⑭ 龙游	“龙游”县	五代以后	《太平寰宇记》《宋史·地理志》、民国《龙游县志·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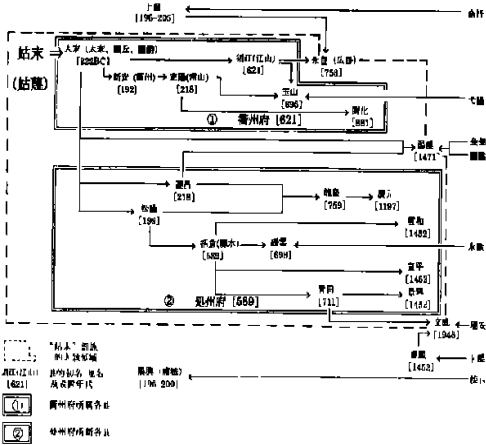


图 1 故“姑末”之地历代各县的析置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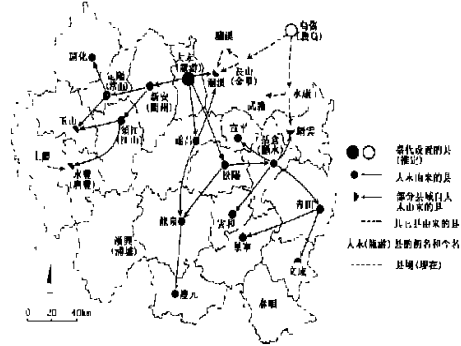


图 2 秦大末县由来各县的分离析置

应该注意的是,秦之郡县并非全是秦代新创的。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对于先秦古玺、兵器、货币的铭文的相关研究表明:郡县制在春秋时已有萌芽,尤其是“县”这一古代专制国家的支配机构,其原始形态甚至可以上溯到西周。到了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得到推行。实际上

秦和汉初的县,有很多在战国时已经存在。^④

以江南一带而言,在秦之前,吴、越对这一地区至少已有 250 年以上的经营,而秦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公元前 222 到公元前 209 这十几年的时间。因此从行政管理来说,秦汉会稽郡的地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来吴越两国的领域。虽然在现存史料中尚难找出春秋战国时“姑末”之地行政设置的直接记录,但根据上面表 1 的分析,秦汉时期会稽郡大末县的县域,最大可能就是原来从属于越国的“姑末”部族领域的继承和延续,至少可以说,秦汉大末县是在周代以来故“姑末”之地数百年开发的基础上设置的。而后来历代以大末县为母体的各县的分离设置,正反映了这一地域渐次开发的过程。因此,进一步考察大末县之沿革地理,即秦汉以来本地区地方分权化的过程,方可探讨故“姑末”之地区域演变和人文开发的历程。

从这一观点出发,汇集以大末县为母体的各县的沿革史料作成图 1、图 2。图 1 主要根据吕以春、谭其骧的研究成果和正史、地志所收相关资料作成,图 2 是图 1 所示各县沿革的空间表现。^⑤这其中,今浙西南各县的沿革主要依据吕以春整理的《浙江省建置沿革表》,^⑥内遂昌、缙云两县的

④参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377 页,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2 版。

⑤考虑到本地区各县置后少有罢并,境界线一般也比较稳定,兹为作图及说明简便,姑取今县境绘制。图中的各县境界线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所收“浙江省”图、“福建省”图、“江西省”图;《武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所收《宣平县全图》绘制。

⑥吕以春《浙江省建置沿革表》(《浙江分县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名称或始置年代, 历史记载稍有差别, 但不至于影响本地域开发史的大线, 可以取其中一说。^⑦ 赣东北上饶、玉山、永丰三县的设置, 据《三国志》^⑧《新唐书》^⑨《元和郡县图志》^⑩及同治《广信府志》^⑪的记载; 闽北汉兴县的设置, 据《浦城县志》^⑫的考证, 均可大致解决。惟松阳县的成立, 虽文献记载分自今沿海之台州, 但据谭其骥的分析, 其人文开化实渊源于衢江流域, 此点于处州一府的开辟和“姑末”地域成立与否至关重要, 故征引如下:

自龙游溯灵溪而上, 逾仙霞岭脉下瓯江流域者为支线。人文开化之途径, 间有不能以山河自然形势测定者, ……开辟处州者不来自瓯江下游之温州而来自衢州, 又其一例。瓯江上游之支流松溪, 与衢港支流之灵溪, 略成南北一直线, 两源相去极远,^⑬ 先民盖循此线自龙游南向移植(今筑有公路, 仍为衢、处间往来要道)。至汉末孙氏, 遂启遂昌、松阳二县。惟遂昌析自龙游, 六朝时犹北隶于东阳郡, 线索甚明; 松阳, 《元和志》以为析自“回浦”。六朝隶于永嘉郡, 似与衢港无涉。斯盖政区之划分, 有不尽与移民来源相符者; 而《元和志》之说, 又未必无可置疑。椒、瓯两江流域汉世已立之县惟有“章安”、永嘉, 若谓“章安”、永嘉之人已西向繁殖于数百里之遥之松阳, 则何以中间临海、仙居、丽水、缙云、青田诸县, 反迟至吴、晋、隋、唐始立县耶? 自遂昌、松阳渐展而东而南, 隋始分松阳为丽水, 唐始分丽水为缙云、青田, 分遂昌、松阳为龙泉, 宋始分龙泉为庆元, 明始分丽水为宣平、云和, 分青田为景宁, 与温、台二府绝不相涉, 线索亦至为分明。^⑭

理清秦大末县和她的子县之间的关系之后, 即可看出历史上“姑末”之行政区域演变和人文开发的概略。

从上面的分析知道, 秦之大末县, 上承西周“姑末国”之历史渊源, 下接历代“姑末”地域之人文开发。而后世的衢州、处州两府诸县之设, 则大抵肇基于秦之大末县。东汉、三国吴之时, 本地区始有新安、定阳、松阳、遂昌四县自大末县的分析。自晋至唐初武德四年(266—621), 又以先期析出的新安、松阳为母体, 分设了须江、括仓两县。唐宋时代, 江南的开发进入一个活跃的时期, 在唐

初, 即有分须江、定阳、弋阳三县置玉山县, 分括苍(即隋之括仓)、永康两县置缙云县之举。此后, 又有青田、永丰、龙泉、开化、庆元五县从先期既设的县中分离出来。这一时期县的设置, 主要由于当地人口、赋税的增长, 可以说主要出于经济的原因。到了明代中期, 为平息在浙西南山区的民众反乱, 又形成了一波分县的浪潮, 一时间本地区便增设了云和、宣平、景宁、汤溪等县。这一波县的设置, 可以说主要出于政治、军事的考量。此后, 除去个别的短暂的变动之外, 本地区的行政格局未见大变化, 各县的区分稳定地维持了500年以上, 一直到现代。

当然, 县的分离设置这一事件本身, 除了开发史上的意义之外, 应该也是一种蕴涵地域性意义的现象。为此, 以图2为基础, 将秦大末县由来诸县的范围、即大约与唐代的处、衢两府相当的地理区域为对象, 作成图3以便对两府的立地状况作一些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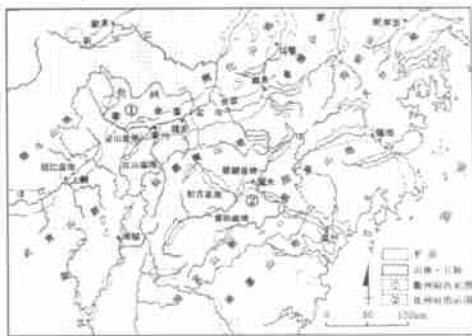


图3 处、衢两府的立地状况

^⑦关于遂昌县的名称或始置年代, 最早的两条记录有分歧, 《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谓:“建安二十三年立遂昌县”, 《宋书·州郡志》谓:“遂昌令, 孙权赤乌二年, 分太末立曰平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但据1979年出土的“遂昌令印”知东汉末或三世纪初已称“遂昌县”(资料1), 故从《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缙云县始置年代, 新旧两《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各异, 分别为698年、621年、696年, 以始置时间最晚计, 姑从《新唐书》说。

^⑧《三国志·贺齐传》:“(建安)十年, (贺齐)转讨上饶, 分以为建平县。”是为上饶县始见于正史。

^⑨《新唐书·地理志》“江南道”之“玉山县”。

^⑩《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四·信州”之“上饶县”、“玉山县”。

^⑪同治《广信府志》(蒋继洙等纂修, 江苏古籍出版社据1873年刻本影印, 1996)卷之一《地理·沿革》之“广丰县”条, 28页。

^⑫参余奎元《建县及定名浦城时间考略》(载蒋仁等编《浦城县志》1376页, 中华书局, 1994)。

^⑬钟案: 即今遂昌县妙高镇与新路湾镇之间, 当为“相去极近”方妥。

^⑭谭其骥前揭②412页。

从图 3 上看,处于江南山区丘陵地带的处州、衢州两府,北挟杭州——开化山地,西、南两方与闽赣山地相连,东面和属于原婺州府的金衢盆地东半部,以及属于原“东瓯”地域的瓯江下游接壤。在地形上虽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体,但由衢江、瓯江、信江及其支流横向摆动(侵蚀——堆积)而形成的河谷平原为数也不少。这些河谷平原,大多分布于红色盆地之中,土质肥沃而且便于灌溉,构成传统农业的精华用地,是本地民众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以处、衢两府而言,以面积约 3500 平方公里的金衢盆地西半部为中心,包括常山、江山、松古、碧湖、云和等大小数十个盆地在内的盆地群。各个盆地往往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小单元,而盆地与盆地之间,虽有山岭的阻隔,但是利用河川和山道的交通,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并不算太困难。



资料 1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罗福颐主编,文物出版社,1987)所收两方官印

此书收有东汉末或三国初“遂昌令印”和王莽时代“乌伤空丞印”。前者 1979 年 6 月在山东省滕县出土,滕县博物馆收藏(参见《山东滕县出土两批铜印》一文,载《考古》1980 年第 6 期,496—497 页,501 页);后者现藏故宫博物院。这两方官印的保存,为“姑末”相关各县沿革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按:乌伤县与大末县同为秦代所置,在秦代为大末之邻县(参图 2)。

以上,历史上“姑末”的行政区域演变、人文开发之大线历历可考,再结合自然地理背景的分析来看,后世的处衢两府各县,因为有上溯秦之大末县乃至周代的古“姑末国”的共通之历史渊源,将它定义为一个历史人文地域可以成立,在此且称之为“姑末”地域。

三 处衢地方的现代汉语方言与“姑末”地域

至此,利用沿革地理资料确定了“姑末”地域,

并考察了处衢地方之共通历史渊源。就目前而言,要想依靠有限的史料再进一步了解这一地域的文化特质,大约已经很不容易。不过,在中国的东南地区,方言的地理分布与行政区域的演变、历史文化地域的形成等事象之间,向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浙江省,长久稳定的行政区划格局,对各种方言的分布以及各个历史文化地域的形成影响深远。研究表明,在浙江省,县的析置过程与方言的传播过程密切相关。^⑤因此,在本节中,援用现代方言分布的调查资料,尝试从另一角度对“姑末”地域及其文化特质、地域性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再作进一步探讨。

最近数十年间,随着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的推进,方言地理学的资料不断丰富,中国全域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状况已经趋于明朗。现在我们知道,汉语是世界上方言最复杂的语言之一,特别是中国南方的汉语方言,其语言变异与地理分布最为复杂。而其中主要分布在江南东部的吴语,因具有区别于其它汉语方言的显著的地方特色,并拥有近 7000 万人口,而成为汉语的一大方言。当然,在吴语内部,又存在着数个带有地方色彩的次方言区,即所谓的“方言片”。

多次方言调查揭示,分布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地域,即原浙西南处、衢两府地方的方言,既具吴语的共同特征,又有自身的特点,且受到相邻的闽语的影响,可以列为现代吴语中的一大次方言区,即所谓“吴语处衢片”。^⑥在本节中,取现代吴语处衢片的分布区域,与秦大末县由来诸县的分布区域,即“姑末”地域相叠加,由此作成图 4。

从图 4 上比较吴语处衢片和“姑末”地域的分布看到,除去一小部地区之外,两者的分布区域大致重合,也就是说,两者在空间上的整合度相当高。对于这一现象,只能从秦之大末县渊源于“姑末”这一点来解释,即“姑末”地域的地域文化在现代方言分布上得到显著反映。远离战乱频发的中原地区,稳定的行政设置,当然应该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使得“姑末”地域虽历经数千年,而自身的某些文化性格依然得到较好的保存。

^⑤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章《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⑥以现代吴语处衢片的主要分布区域浙江省而言,据傅国通等《吴语的分区(稿)》之“后记”(《方言》1986 年第 1 期,7 页):浙江省的方言,1949 年以来做过三次大的调查,分别为 1957 年(60 余个方言点)、1959 年(50 个方言点)、1964—1966 年(70 个方言点)。其调查可以说覆盖了浙江全域。



图4 “姑末”地域和现代吴语处衢片的分布

本图主要根据图1、图2及下列地图、资料作成。《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所收《明清青田县政区图》, 傅国通等《吴语的分区(稿)》, 颜逸明等《吴语江西省内的分布》(《方言》1984年第4期, 236-259页), 郑张尚芳《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方言》1985年第1期, 39-45页)

在新近有关吴方言的研究中, 游汝杰通过从浙南吴语到上古音的深入研究, 观察到了残存在南方方言底层部分中的非汉语要素。^{④7}而郑张尚芳则汇集吴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诸语言事象的表现, 进一步推断: 存在于现代吴语中, 与普通话差异较大, 而与侗台语有相同的一些语言特点, 应该是吴语的底层, 即古越人语言的遗存成分。同时, 郑张尚芳还注意到了现代吴语区和古越语的分布区域, 即古吴越两国的主体疆域大致重合。^{④8}两氏对吴方言的上述论断, 揭示了现代吴语的上古语与古越语、现代吴语的分布与古代越人的分布之间的关系, 意味深长。援用两氏的研究成果, 并基于图4所显示的吴语处衢片与古“姑末”地域在空间分布上高度整合这一事实, 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图4所表现的语言分布与历史地域的高度整合, 强烈显示出处衢地方的方言与“姑末”部族在文化上的渊源、以及现代吴语处衢片的分布与古代“姑末”部族的领域之间的联系。类似于现代吴语与古越语的对应、现代吴语地理分布与古代越人地理分布的整合, 现代吴语的下位单位——吴语处衢片, 从地理分布上说, 应该与古代越国的下属——古“姑末”的地理分布也有一定程度的整合, 从语言上说, 应该与古“姑末”人所操言语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对应, 否则无法解释图4的现象。由此来看, “姑末”部族当然应该属于古越人, 乃至于是古越人的一支, 并且应该是具有地域文化性格的部族了。这一从方言地理角度得出的结论, 正与本文第一节中通过文献分析得出的结论取得

一致。

可是, 从地形上看, 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700万^{④9}的吴语处衢片的分布区域, 虽然在交通上有形成一个独立地域的可能, 但也并非可以简单地发育成为统一的语言地理单元。为此作成图5再作以下分析。



图5 江南东部的现代汉语方言分布

上面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这一区域处于多个水系发源地, 它的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属于瓯江、闽江、信江和衢江四个不同的流域, 而构成本区最主要生活空间的河谷平原, 顺着这些四散分流的河川由区域的中心向外部呈离心型分布。这种离心型分布, 比起相邻方言区, 如沿金华江河谷发育的吴语婺州片、沿灵江河谷发育的吴语台州片、沿新安江河谷发育的徽语区那样的向心型方言地理分布相比, 显得更为零碎和分散。因为, 像这样一种属于不同流域的、拥有众多中小片的河谷平原的集合, 常常会因为缺乏一个中心城市的吸引效应, 而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上更容易被属于同一流域的他方言区所吸收和分解。更何况在处衢片的周围, 有衢江(钱塘江)下游的兰溪、杭州, 瓯江下游的温州那样的很有吸引力的区域中心的存在。此外我们还注意到, 这一区域内部则为数条

^{④7} 参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七章《方言比较》(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④8} 具体地说: “古吴越两国的主体疆域在今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以及皖南赣东北地区。现代在这一区域内的主体方言为吴语, 分布正大略相似。……吴语所以形成自成一系列的汉语方言, 显然与古越语的历史背景有关。古汉语与这一地域内古越语的结合才形成了一支自有特色的方言, 所以两者分布才这么吻合。”参见郑张尚芳《古越语》(《吴越文化志》前掲^②, 第310-311页, 253页)。

^{④9} 根据肖建中等编《中国市县概览》(海洋出版社, 1991)所载各县面积和人口概算。

高峻的山脉所横断,在这些山脉之中还有不少海拔超过 1000 米的高山。这样的地形条件,对区域内部交流和方言的整合也构成不少的障碍。而吴语处衢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却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成了。这一现象着实耐人寻味。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分布于金衢盆地西半部的现代吴语处衢片,至今仍然在龙游县与金华、兰溪两县的行政境界线附近,同分布在金衢盆地东半部旧婺州府所属各县的现代“吴语婺州片”相对峙。显而易见,吴语处衢片并未扩散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入的金衢盆地东半部。依笔者看,一个主要的理由是,金衢盆地东西两部分自古以来存在着明显的基层的差异,各自的文化性格都很顽强。至于产生这种基层差异的背景,则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史实:至迟在 2200 年前的秦代,金衢盆地的东、西两部就已经有了乌伤(资料 1)、大末两县的分置,而后世金衢盆地的东、西两部各县的分离设置,一直受这种分设格局的强烈影响。类似乌伤、大末的情况,亦可见于瓯江流域(上游处州与下游温州的对峙)、信江流域(上游吴语区与下游赣语区的对峙)的河谷平原。

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吴语处衢片的分布区域形成,地形的影响相对较弱,而通过语言所表现的“姑末”地域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则显得相当顽强。

从这一意义上说,吴语处衢片是在克服地形条件制约中发育形成的。

以上,从多个角度对“姑末”地域的形成作了初步的探讨,所幸“姑末”文献史料的存真,使得这一地域粗略的演变历程尚有迹可循。若从广域的视野观察,在东南中国,至今仍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历史人文地域,诸如徽州、婺州、台州、东瓯,乃至闽东、闽南、闽北、客家等。虽然有些地域形成的历史地理尚不甚明朗,但从共通的“百越”历史渊源和类似的自然生态条件来说,它们与“姑末”地域的形成应该有着相似的背景。以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产生、发育和成立,在很多方面应该与“姑末”地域可以相互参照。有关各地域发生和比较的论证,还需经过各方面资料的汇集与整合,留作今后研究的课题。

此外,有关江南河谷平原地带中历史人文地域的研究,今后还应考虑更多地利用地方史料以及现代田野调查资料,开展有关地域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大尺度的、更细致的研究,以进一步探索此类地域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当然,这样的研究也有待于考古成果的积累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推进。

On the *Gur-mo*

——A Historico-g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Middle Riverine Tracts” in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ZHONG Chong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8501, Japa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historico-g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Gur-mo* (姑末) area, which belongs to “the Middle Riverine Tracts” in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by geographical division. The author trie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the *Gur-mo* area from the diachronic viewpoint. For this purpose,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Gur-m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hang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the *Gur-mo* area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modern period, and the language atl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gional dialect, are mainly used. Then the author give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exist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ur-mo* area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stability and other features of 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of the *Gur-mo* area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the *Gur-mo* area;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Middle Riverine Tracts; historico-geographical study

(责任编辑:朱晓江)